

抗战时期王献唐与孔德成等保护 山东珍贵文物史实考证

李勇慧

清末与民国时期，山东省图书馆（附设山东金石保存所）是山东唯一的重要文化机构。抗战时期，其珍藏的万余件商周彝器、历代石刻、古籍宋元珍本、名家字画、秦汉砖瓦、历代古钱等古物精品，南迁至曲阜孔府、四川乐山大佛寺等地，保存 13 年，躲过日寇炮火而幸存。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及中国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之际，笔者从海峡两岸珍藏档案中抉微钩沉，向世人揭示先辈在民族危难存亡之际，精心守护山左文脉的爱国精神。

一、缘起

1. 王献唐与孔德成生平简介

王献唐先生（1896-1960），名凤馆，字献唐，号凤笙，以字行，室名双行精舍、顾黄书寮等，山东日照人，青岛礼贤书院文科、青岛德华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土木工程专业毕业。1929 年 34 岁前，历任《山东日报》《山东商务日报》编辑、

山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国文教员、胶澳商埠督办公署帮办秘书、京汉铁路局文书科办事员、国民党中央党部训练部总务科总干事，自 1927 年起，师从国民党元老、经学大家丁惟习音韵；1929 年 34 岁至 1960 年 65 岁去世长达 31 年的时间里，先后出任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山东金石保存所负责人、山东古迹研究会委员兼秘书、国史馆筹备处副总干事兼纂修、山东省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山东省博物馆筹备处副主任等职，成就卓著。在 1929-1937 年主山东省立图书馆（金石所）期间，潍县陈氏万印楼藏印、滕县等地新出土汉画石、潍县高氏藏绝世砖瓦、历城马国翰收藏泉币、聊城杨氏海源阁藏书、曲阜孔氏微波榭藏书等山左珍贵图书文物，大多网罗馆中。据《王献唐师友书札》的记载，当时北平图书馆的王重民赞其曰：“贵省图书馆得先生经营，收藏之宏富，建筑之良善，驾苏、浙而上。在省立图书馆中，屈一指矣！”1937 年日寇侵华，毅然舍妻别子，择山东文物精华，载之播迁，辗转万里，

[作者简介] 李勇慧，山东省图书馆副馆长、山东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历史学博士，研究馆员。

历尽艰辛，分藏于曲阜孔府、四川乐山大佛寺，山左文脉赖以保存。王献唐一生治学严谨，精于文字、音韵、训诂、考古、金石、古史、目录、版本、校勘之学，对哲学、诗词、书画、篆刻、建筑等，亦颇具造诣。著《公孙龙子悬解》《春秋郑分三国考》《临淄封泥文字》《五灯精舍印话》《炎黄氏族文化考》《中国古代货币通考》《国史金石志稿》《双行精舍书跋辑存》《宵幽古韵考》《汉书食货志订议》等，总计逾千万字，被叶圣陶、夏鼐等誉为“山东省近几百年来罕见的学者”。总括其一生，堪称“学术事功俱隆、文章道德并富”的国学大师。

孔德成先生（1920-2008），号达生，出生于山东曲阜，孔子第77代嫡长孙，1920年袭封第32代“衍圣公”，1934年起改任“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先后师从吴伯箫、詹澄秋、王毓华、庄陔兰、吕今山、丁惟汾等人学习国学、英文、古琴、书法等。1937年抗战事起，鼎力协助王献唐先生保护山东珍贵文物于奉祀官府。12月离曲阜至武汉，发表抗日宣言，鼓舞了士气。1938年至1946年居重庆，与丁惟汾、傅斯年、王献唐等先生研习国学，主持成立“中华孔学会”，组织名家，召开讨论及宣讲会，研究弘扬孔子学术思想与民族精神。在台期间，历任“考试院”院长、“总统府资政”等公职。兼任台湾大学中文系、人类学系教授，讲授三礼研究、金文研究、殷周青铜彝器研究等课程。著《礼记释义》《金文选读》等。工书法，从二王入手，后转颜体及北魏张猛龙碑。

2. 王献唐与孔德成交游考

1937年5月21日，王献唐先生与“衍圣公”孔德成先生初次见面，地点在曲阜奉祀官府，此时距“七七”事变仅月余。此日，献唐先生因运

汉画像石至省立图书馆（山东金石保存所）保存一事赴曲阜，由当时正在为奉祀官府刊印《孔氏族谱》的书商彭辑五代为引见。初次见面，孔先生即极为热情周到，盛邀献唐先生搬至奉祀官府内居住，并谈及阅读王先生《公孙龙子悬解》《临淄封泥文字》等著作之感受，颇有见地，大出王先生意外。献唐先生在此日日记中写道：“与辑五同至奉祀官府看其印刷设备，即拜谒奉祀官孔德成及其总管孔联芳。即出见谈，一时辞去。两君招待甚殷，并约余搬居府中，谢之。达生年方十八，人甚聪明，言语得体，力学不倦，谈及学术，具有本源。并言屡读余之著作，历历其要点不爽，为之惊异。”1936年，国民政府聘丁惟汾为孔先生导师，讲授《毛诗》及古韵，与王先生成为同门。抗战时，因守护山左文物的共同伟大使命，相识日深，更因义气相投成为莫逆。1940年11月，王先生移居重庆歌乐山向家湾国史馆内，与孔先生为邻。孔先生多向其请教商周彝器与古文字之学，精研《仪礼》。1941年1月26日旧历春节，孔先生邀王先生至其寓共度，以解其孤寂思亲之苦。1943年3月，王献唐离开重庆国史馆，到四川南溪李庄中研院史语所借住，续撰中英庚款管理委员会、国史馆研究任务《中国古代货币通考》《国史金石志稿》，孔先生倍感孤独，来信云：“此处自兄西上山中，更少过往，孤独学无友，益觉孤陋寡闻，风晨月夕，更怀故人耳。”1949年，因海峡隔断。1960年，王先生病逝，阴阳两隔，却难阻思念。1995年，孔先生曾有至青岛大学参加王献唐先生学术研讨会之意，竟未成行。他在1994年为王献唐墓书篆体墓碑，并撰《王献唐先生墓表》，铭曰：“已乎献唐！往也者，人能论其短长；来也者，焉能前知其炎凉。下学上达，既无愧乎乡邦；固穷守约，又何让于

古之贤良。已乎献唐！”

献唐先生一生尊崇至圣先师孔子，认为“孔子在中国学术文化政治社会所占之地位，自应为万世师表，永世尊崇者也”，故对民国“十八年、十九年各县新典妄人擅毁圣庙”的行为，“思之切齿”。而早在1931年，将其斡旋半年所见清乾隆时期孔氏著名学者孔继涵《微波榭遗书》《通德遗书所见录》《孔氏说经稿》底本等，协归曲阜孔家，认为“盖书为孔氏名著，不欲任其流入他人之手”。

3. 南迁文物存放孔府原委考

1937年5月的这次见面，更加深了献唐先生对孔子思想的了解，也促成他在国难之际，做出了重大的选择，即在抗战伊始山东省教育厅决定将山东省图书馆（金石保存所）珍贵图书文物迁至南京中央博物院保存时，他坚定地认为存放到曲阜奉祀官府更为妥当。事实证明，这一选择是非常正确的。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夕，为保存中华文脉，故宫博物院、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等国立文化机构与各大学名校，纷纷奉令南迁。多位著名的私人藏书家如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等，亦将珍藏古籍等迁移至安全之地。7月7日，日军制造了卢沟桥事件，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北京、天津先后沦陷，日军铁蹄沿津浦铁路直驱南下，济南亦陷危境。而当局无暇顾及本省图书文物，王献唐为筹备防空设备经费，四处奔走。8月初，随着日寇铁蹄沿津浦铁路直驱南下，济南面临沦陷危境，居民与机关人员纷纷逃避，店铺关门，居民逃避，市内几乎十室九空。王献唐一方面批评政府“识不坚，心不定”，一方面为防山左文物毁于兵燹，通过省教育厅呈报省政府主席韩复榘，请求省政府拨付南迁经费并安排车辆。8

月13日，接省教育厅转来教育部覆厅电，谓馆中古物、书画、图籍已征得故宫博物院同意，可放存该院南京之保存所。14日，献唐先生嘱编藏部主任屈万里开始挑选图书文物精品装箱。

对于南迁地点，献唐先生与主管机关有不同意见：“赴教厅晤静庵，商古物书籍保藏办法，余意欲移藏曲阜圣公府，静庵认为未妥，仍决定移京。”他认为，南京是国民政府的首都所在地，必定成为日军的侵略重点目标，且北平故宫博物院保存在南京的文物已西迁至湖南长沙，此时将山东珍贵文物迁至该处，安全未有保障。选择孔府，更重要的原因是基于他对孔先生的了解，认为孔先生是担当起保护山东文物最可靠的人选，而曲阜奉祀官府则是当时国内最为妥当的藏书之地。在1937年10月17日致屈万里的函中，王献唐写到：“无论如何，亡国奴帽子至海枯石烂，兄决不戴也。此刻，各社会教育机关主管人，大约只有兄一人在此。……遍观省内各地，无如此间妥者。既有人帮忙，又有特殊之力量无形保护，过此则遍地荆棘矣。”遂于10月12日向省厅报备南迁文物目录后，修书一封，派员持之，与馆藏第一批文物，启运曲阜奉祀官府。孔先生阅信后，当即在府内接洽房舍，妥为安置。

在第一批文物启运前，南迁文物车辆与搬迁经费皆没有着落。省主席韩复榘在省馆请求政府派车南运的呈文上，批了两个大字“不理”，却又得到众多爱国人士如济南市财政局局长邢蓝田、山东医专校长及附属医院院长尹莘农、济南聚文斋书店经理彭辑五等人，在运输经费、运输工具、人力等多方面的鼎力相助，使这批文物得以安全地南迁到妥善之地，并躲过数次灾难而得以保全。

二、南迁经过

1. 一迁曲阜奉祀官府

1937年10月12日至12月19日，山东文物精品31箱，在向省教育厅报备后，先后分三批运存曲阜奉祀官府内。

10月12日晚，献唐先生选派办事妥贴的编藏部主任屈万里、工友李义贵冒敌机轰炸津浦路之险，搭乘尹莘农院长提供的省附属医院专车，押运第一批山东文物10箱离济赴滋阳（今兖州）。书至滋阳车站，遇敌机轰炸，幸得彭辑五寻得车夫才得运抵奉祀官府。甫到奉祀官府，孔先生读完屈万里带来的王先生函，当即应允，立即派人安排僻静而又完善的房舍，存放山东公藏珍贵文物。屈万里回忆：“晋谒奉祀官孔德成德成先生，接洽房舍，当承慨许。孔公年甫十九，温温儒雅，而应事明决，望而知为非常才也。”随后，屈先生将孔先生细致的安排写信报告王先生。王先生非常高兴，在回信中写道：“将来兄南下第一步即至曲阜，曲阜为馆中办事处”。10月23日，第二批山东文物2箱由彭辑五从济南捎运至曲阜；11月中旬，济北倭寇，又复南逼，韩复榘乃令所部，退守黄河南岸，并自毁铁桥。倭寇以鹤山为炮兵阵地，隔河射击，弹落千佛山、白马山间，一时人心大恐，纷纷出走。11月16日，王先生亦至曲阜，住阜城近圣居。

12月13日，南京陷落。17日，王先生回济南，选第三批山东文物19箱书籍砖瓦，于19日托彭辑五运抵曲阜。此时津浦日寇又将南侵，20日，王先生旋因济南战事愈紧愈紧返曲。

2. 二迁四川万县

12月22日，韩复榘下令实行“焦土政策”，放火烧掉可资敌用的包括山东省立图书馆在内的济南市重要建筑物、设备，以空间换时间，以此

阻止日本侵略者的攻城掠地，并率军队撤离济南。时任省教育厅长何思源回忆：“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韩复榘本人留下十二军孙桐萱断后，并放火烧掉省府、日本领事馆和济南市重要建筑物，他本人同蒋伯诚也离开了济南。”

时在曲阜的王先生此时并不知道省馆惨状，只是迫于时局，为文物安全，决定继续南迁。适省立医院奉命改组为第十重伤医院，将以专车往汉口，经与尹院长协商同意随车南下，但只能装载5箱。于是从第一次运至曲阜的10箱书籍文物中精选其半，余26箱仍存奉祀官府。在离开曲阜前，王先生与孔先生商订了妥善的寄存办法。据献唐先生后人云，当时两位先生做了这样的约定：若国亡，寄存的古籍文物，则为奉祀官府所有；若光复，寄存的古籍文物，则归还省图。

12月27日，王献唐、屈万里、李义贵三人启行南下，屈万里在《载书播迁记》中记载，他们“过铜山，经汴郑，出武胜关，凡八日行程，三遇空袭，而抵汉口。”南下当日，济南陷落。此时，国民政府特派官员护送奉祀官离开曲阜至汉口。在汉口，孔先生发表抗战宣言，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日斗志。

汉口亦非久留之地，敌机时来空袭。时山东大学师生亦在汉口，奉教育部命，将迁至四川万县开学。时任山东大学校长林济青邀请王先生任中文系教授。王献唐考虑馆中书籍文物能与山东大学书物一起运送，又可免经费短缺之困，也相对比较安全，于是应允。

1938年1月19日，将书籍文物箱件交太古渝公司转运，同时他们一行三人也自汉口起身，逆江而上，一路艰辛。在宜昌，险丧生于敌机狂轰乱炸中。2月4日，抵四川万县，居市内三日，即移入山中，于阆洞子西马超湾山村中赁一民房

居住。4月上旬，馆中书物始由太古渝公司运到。尔时山东大学已奉命解散，但王先生决定仍留万县，暂不他移。在万县期间，薪俸不继，生活艰苦，但王先生与屈万里“或静对治学，或登峰远眺，几忘身世之痛”，共在万县停留8个月时间。

3. 三迁四川乐山

时敌机常来万县附近空袭，文物安全又受到影响。8月，在经傅斯年推荐成为“管理中庚庚款董事会第一届协助科学工作人员”，每月得专款二百银元资助进行学术研究，但按例须到大学工作后，鉴于万县无大学之情况，遂接受黄炎培的建议与帮助，经教育部批准后，将馆中书物西迁至四川乐山存放，因国立武汉大学于1938年初迁于此地。

乐山，古称嘉定，历史上属古蜀国地，位于岷江、大渡河、青衣江三江汇合处。据屈万里在《载书播迁记》中的记载，24日，文物运抵乐山，“旋僦居于城内天后宫中。自载书离稷下，流徙至此，程凡七千余里，尔后馆中文物，当不至再播迁矣”。据李义贵回忆，依照防虫防蛀、安全严密的要求，“选择了大佛一侧隐而不露，且朝向好、易干燥的崖洞，妥放箱件，砌堵洞口。”自此，三人羁栖于岩窟佛寺，虽衣食不继，而意志弥坚。王先生名其室曰“那罗延室”，取坚牢不破，永守齐鲁文物之意。在乐山，时有敌机轰炸，每遇空袭警报，大家纷纷四散于防空洞中，唯独献唐坚守书籍文物。别人劝其暂时躲避，他总是笑着说：“这些东西是我的生命，一个人不能舍了自己的生命。”

时因政府拨款不及时，王先生用个人研究费用，支付馆藏物品存储租金与三人生活费用。为了生计，1939年5月11日，屈万里离开乐山，至孔先生所在的重庆歌乐山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府担任文书主任。1940年3月，王先生接受在重

庆歌乐山向家湾新成立的国民政府国史馆筹备委员会聘任，担任顾问。国史馆数次来函，催其至重庆办公，王先生“以馆物存乐山，一时无人代管，正在觅人。在觅得前，拟在乐山为会中工作，如季刊、论文及审查《大事记》稿等，似亦不须驻渝”等理由请假，并到成都各处，为国史馆搜访史料，及抄集各图书馆藏史料目录。10月，在国史馆多次催促下，王先生将馆藏文物保护办法向李义贵做好交待，离开乐山到达重庆，与丁惟汾、孔德成、李炳南、邢仲采、屈万里、吕今山等人重逢，往返论学。此时物价飞涨，生活十分艰难，李义贵有时不得不兼做小商贩以糊口，其在《李义贵自述》中云：“随着战乱的加剧，其仅有的生活来源也断绝了。迫于生计，我只能去江岸搬运，清淤除污，担砂扛石，给人帮工，摆地摊，卖香烟，售菜果，朝出暮归，自炊自食，以微薄的收入藉以糊口，年复一年地熬过了十三个春秋。”李义贵为保护齐鲁文脉居功至伟，值得铭记。

1943年3月-1945年9月，王先生借住四川南溪李庄史语所，继续为国史馆撰《国史金石志稿》，为中英庚款会撰《中国古代货币通考》。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3日，国民政府下令举国庆祝，史语所举行庆祝大会，王先生“为写大会匾额”，“六时半，复举行火炬游行”。随后收拾行装，于9月11日，下山乘船赴重庆。10月17日，何思源抵重庆，晤王献唐，请其回济南主持山东省立图书馆工作。其《平乐印庐日记》记曰：“日前何仙槎飞渝，今午来见鼎兄，言图书馆现为李吉甫司令部，已派人接收房屋，嘱余即往主持。”

王献唐在四川期间，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神经痉挛症时常发作，脑疾日重，目不能见光，头

不能见风，失眠更甚。因四川地湿等原因，至抗战胜利时，王先生“患脑目之疾已半年，在李庄治疗未愈”，尹莘农诊断其为“第七（对）脑神经病”，乃赴重庆歌乐山上海医学院诊治，未愈。1945年10月25日至1946年12月31日完全中断持续25年之久的写作日记习惯。不得已，1946年9月，随国史馆乘船离重庆，经40天始达南京。1947年1月，国史馆在南京正式成立，被任命为纂修。此时脑疾日重，怕风怕光，失眠更甚，至中央医院鼓楼医院诊治。在治病期间，为存曲阜大成至圣奉祀官府和四川乐山图书文物事多次与山东省教育厅磋商运回办法。6月，存放曲阜的图书文物运抵南京，寄存于国立中央博物院院内。存放于乐山的文物，因运输不便，仍藏原处，由李义贵等看管。是月，因右边痉挛不止，疑为脑膜有瘤压迫所致，至北平做开颅割瘤手术。开颅后，发现脑膜上并无瘤。然手术所致，左边瘫痪，治数月后有所好转，然身体状况日差，此时，王先生50周岁。比身体病患更令人心痛的是亲人阴阳永隔。王献唐有四子，其中有两个死在了四川。与王献唐一同护书南下的屈万里、李义贵，其亲属亦天各一方，或杳无音信。

1947年10月，在外漂流十载后，王先生由北平返济南，住经十路33号，省政府仍任其为省立图书馆馆长之职。因病魔缠身，多养病家中，由代馆长罗象临（复唐）主持工作。

1948年9月24日，济南解放，军管代表进馆接收，王先生去职。因王先生抢救山东重点文物之贡献，新政府将每月一百斤的小米救济增加为每月200斤。

王先生去职后，仍万分牵挂南迁文物安危，多次向政府报告，并积极配合新政府迁运南下文物。1949年12月11日，政府根据其提供的重要

信息，将南迁至南京的文物运回济南，由古管会收藏。存放在四川乐山的书籍文物精品，因四川解放较全国迟，于1950年12月25日经由北京运回济南，归省古管会收藏。王献唐、李义贵保护民族文化之功，受到政府表彰。王献唐并与李义贵一起，在本年12月底至古管会工作。1951年1月1日至19日，古管会在济南举办文物展览，展出由胶东、四川运来的文物精品和个人捐献的文物。展览设铜器、陶器、瓷器、玉石雕刻、书画、捐献等陈列室，展出包括1949年春王献唐向古管会捐献书籍12册，及1951年1月捐献宋刻经折本《大方广佛华严经论合刻》1册，引起轰动。

三、南迁文物之种类数量与留存济南图书文物之损失

1. 南迁文物种类与数量

据考证，南迁文物约18000册件，囊括了山东省立图书馆（山东金石保存所）成立30年来收藏的我省金石古物、书籍珍本及字画之精品。张静斋在1949年11月1日致山东省政府杨秘书长的函中指出，“有关全国性的东西均运往四川乐山县，在南京（原存孔府）有的则多是山东地方性的东西”。根据《四川运回古物目录》中的记载，藏在乐山的5箱文物约3000件，精品有商父乙鼎、商五戈足形鼎、商甲骨、周明我鼎、周五敦、秦二世元年诏版、宋赣州州学刊本《文选》、宋宝祐赵节斋刊本《通鉴纪事本末》、刘塘小楷五福颂、郑板桥行书堂幅、石涛山水堂幅，以及明清时期山东名贤手稿、临淄封泥、马国瀚玉函山房藏泉等。

王献唐在1946年4月1日致山东省政府教育厅厅长李泰华的函中对留存曲阜奉祀官府的馆藏文物进行了梳理统计，这些文物计26箱约15000

册件，由五部分组成，“一为善本书籍，一为汉晋石刻，一为铜器，一为书画，一为本省全份县志。”其中多为山东文献，张静斋在1949年11月1日致山东省政府杨秘书长的函中将其划分为六部分，“（一）石刻除石经外，悉为山东出土；（二）山东全省县志；（三）山东历代乡贤著述印本、稿本、钞本；（四）山东名贤画像；（五）山东先哲书画；（六）山东出土之砖瓦陶器，计有一万四五千件”。

南迁图书文物，现存山东省图书馆、山东省博物馆，是两馆的重要藏品与镇馆之宝。文献价值巨大，近30年来山东出版界两次大的山东文献整理出版行动《山左名贤遗书》《山东文献集成》，多以南迁文献为底本。

2. 留存济南图书文物之损失

山东省图书馆（金石所）战前收藏图书文物约25万册件，战后，除南迁者外，留存济南的图书文物幸存者不及战前原藏量的4%，仅存7600册件！当时的代馆长罗复唐在战后的统计时痛心疾首，写下了这样一串带惊叹号的数字：“七七事变后，日兵侵占济南，本馆遂惨遭焚劫！玉佩桥迤东之海岳楼，宏雅阁及馆长办公室等诸建筑，同付一炬！而书籍文物，除王馆长献唐带去一部在曲阜及四川之歌乐山保存外，其余则荡然无存！总计书籍损失二十三万二千余册！铜器损失大小三百二十余件！砖瓦损失一千二百余件！古陶器损失四百三十余件！有文字古陶片损失一万五千二百余片！字画损失七十余幅！其它如玉器、银器、石器种种文物之损失不计焉！二十余年之收藏，忽然废于一旦，有不为之痛心疾首者欤！……近世河洛出土，魏志最多，其能胜此盖寡也，及经事变，遗失颇多。若李壁墓志、汉食堂画像、石鼓文等，均一时杳若黄鹤。其余零星小石，更

无从查究矣！”

四、结语：孔府保存山东珍贵文物的重大意义

著名学者赵俪生曾赞曰：“这是献唐先生在中国文物史上，特别是山东文物、文献史上，永远抹不掉的一份功劳。”作为文化战线工作者，我们同样要象先贤一样，有一种保护与传承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文化自信、高度自觉与历史使命感。

日寇在大举侵华时，不仅对中国的土地、财产进行占领与掠夺，还开始了无耻的、有计划、长时期、大规模的文化侵略与掠夺。日本宫中顾问官兼帝国博物馆馆长九鬼隆一，在战前就制定出《战时清国宝物搜集方法》，并颁发日本各主要部门，鼓吹：“战乱是获得‘宝物’的绝好时机。‘战时搜集’的优势在于可得到平时难以到手的名贵珍品，亦可以极低廉之价格获得极昂贵之珍品。提倡直接由军队进行搜集和搬运，这可以解决沉重物品的运输问题。战时搜集名品，可因战争的胜利而名垂史册，充分发扬国威。”这些言论在日本人小黑诘司所著的《日中图书馆界交流的历史》中都有详细记载。因此，日寇所到之处，上至国家级的博物馆、图书馆，下至私人藏书楼，均遭到野蛮洗劫与破坏，更使我国图书馆事业遭受毁灭性破坏。1937年2月《教育杂志》刊文指出，1935年，全国有各类图书馆4033所。1946年时，全国（不包括陕甘宁边区）的图书馆仅存731所。但在抗战期间，中国军民同在前线英勇抗敌作战的将士一样，在后方为保卫珍贵的文化遗产，以多种方式同贪婪的敌人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保存下来大量的珍贵文物，使中华文脉得以传继。如我国周代青铜重器虢季子白盘，在抗战时期被

清末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的后人秘密掩埋在合肥老家院内，并在上面种了一棵小槐树，铺以杂草作伪装，然后举家迁往他乡。日寇曾多次去寻找都扑了空。直到新中国成立，刘家后人才将这件珍贵的文物捐赠国家；1942年春，山西赵城广胜寺住持力空和尚获悉，占据赵城的日军准备抢走收藏于该寺驰名中外的佛教经典著作金代木板刻本《赵城金藏》，他立即冒着生命危险报告了抗日根据地赵城县长杨泽生。杨县长随即向八路军太岳军区政委薄一波作了汇报。薄一波当即派部队前往广胜寺抢救，将4000多卷珍稀经卷安全运走。在此后的数年中，这批珍贵文物在当地抗战军民的保护下，几经辗转，最终躲过了敌人的搜掠，几位八路军战士也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日军在1938年占领曲阜后，虽未进奉祀官府等“三孔”内部，但以在曲阜八宝山脉开矿为名，在曲阜驻扎部队，进行掠夺。曲阜当地人民与之周旋，保护了鲁国故城与曲阜汉代灵光殿的出土文物。

原故宫博物院郑欣淼院长认为：“保护本国、本民族文化遗产是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一项任务。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看，故宫文物南迁的壮举和成就，是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伟大贡献。”王先生、孔先生等共同守护山东珍贵文物免于敌寇炮火，也是为保护齐鲁文脉而进行的一场中华文化保卫战，这是先贤爱国主义精神的有力体现，其功德亦应做如是观。

[责任编辑：林凡军]